

# FREE WRITING

随笔是随的精神加笔的风格

随是内面的自由，精神的自由，随心所欲也逾矩

笔是一种小型的、边缘的、反规范化的文体

人文，以立人为本。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精神的尺度

无精神，非随笔；不自由，非随笔

林贤治 筱敏 主编

## 人文随笔

2005 夏之卷

花城出版社



# CONTENTS 目录

## 人文隨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文随笔·夏之卷

林贤治, 筱敏主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8

ISBN 7-5360-4576-X

I. 人...

II. ①林...②筱...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4497 号

责任编辑: 张 懿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惠阳印刷厂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开 本 787×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0 2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576-X/I·3638

定 价 2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录 CONTENTS

## 话题

- 2 / 走西部 尚立富
- 6 / 一位代课教师的自述 朱维娇
- 10 / 呼唤阳光 周原

## 天下

- 12 / 闲话广场春秋 散木
- 18 / 几个乡下人等于一个城里人? 徐友渔
- 20 / 矿难和空难的N个不同 刘宇
- 22 / 士无耻则如何 毕延河
- 24 / 城堡(外一篇) 苍耳

## 人间

- 30 / 早年 赵园
- 34 / 没有地址的信 高尔泰

## 面影

- 44 / 梁漱溟为“雅量”而争 钱伯城
- 53 / 回忆诗人艾青 彭燕郊
- 58 / 赫鲁晓夫的黑白墓碑 高莽

## 古意

- 60 / 帝王竟然是龙种 陈鹏鸣
- 64 / 接班、考察与德政 半夏

## · 物语

- 68 / 一头来自异乡的驴子 耿 立  
72 / 想象鸟鸣的幸福 曾 柱

## · 书林

- 74 / 革命不是一种原罪 黄万盛

## · 纪念

###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奥斯威辛解放 60 周年小辑

- 92 / 我为什么害怕（外一篇）〔美国〕埃利·威塞尔 陈东飏 译  
98 / 你的兄弟在哪里？〔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张东书 译  
106 / 抵抗的权利〔德国〕君特·格拉斯 滕奕丹 林笏 译  
112 / 船夫日记（节选）〔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莱 余泽民 译  
118 / 大屠杀对我的作品的影响〔以色列〕萨·里比来赫特 王义国 译  
120 / 面对今日奥斯威辛 林 达  
125 / 日本有个奥斯威辛纪念馆〔日本〕燕 子

## · 西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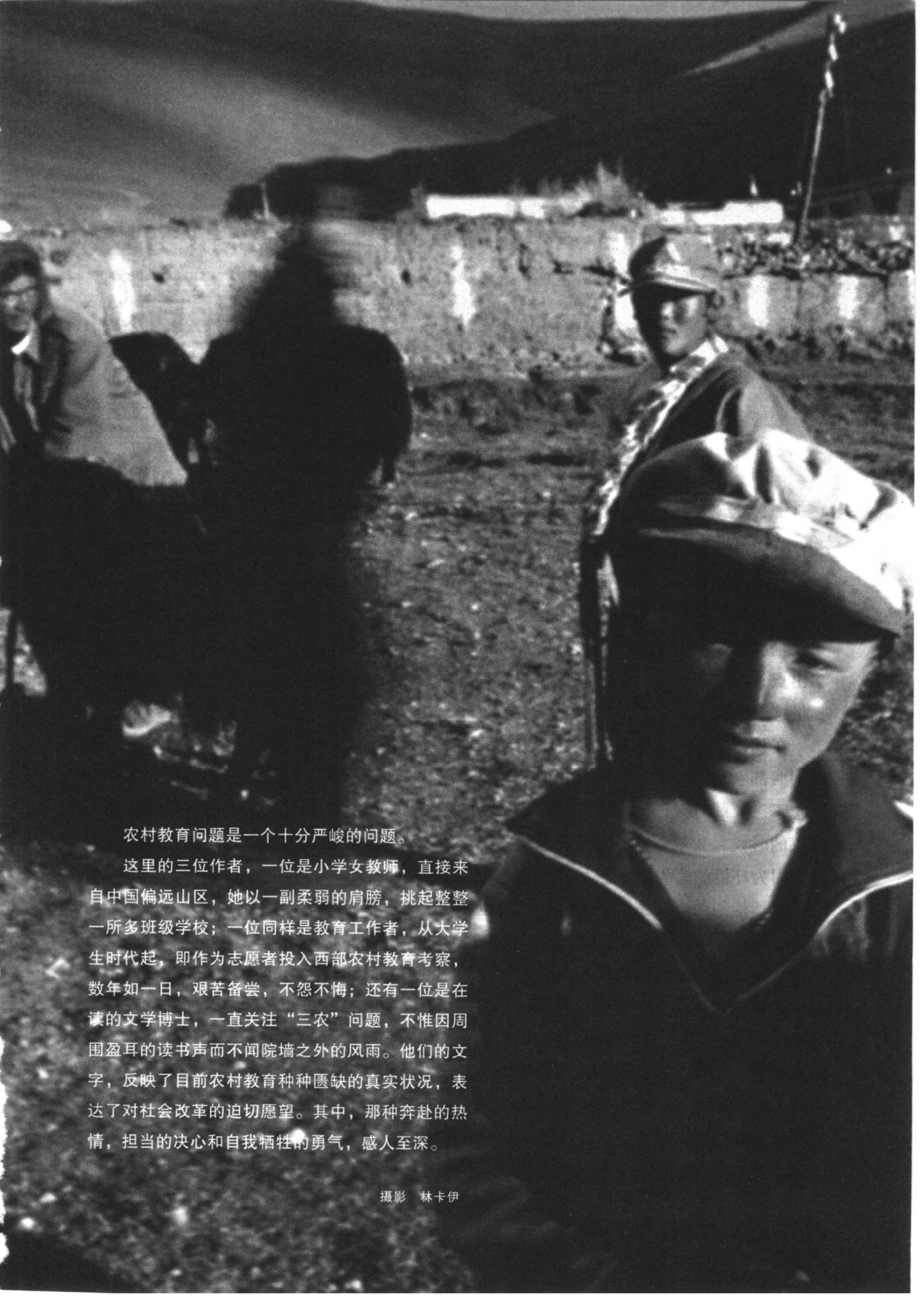
### 米沃什随笔选

- 129 / 流亡手记 周琳 译  
134 / 幸福 周琳 译  
138 / 我是谁？ 周琳 译

## · 声音

- 142 / 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波兰〕亚当·米奇尼克 崔卫平 译





农村教育问题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这里的三位作者，一位是小学女教师，直接来自中国偏远山区，她以一副柔弱的肩膀，挑起整整一所多班级学校；一位同样是教育工作者，从大学生时代起，即作为志愿者投入西部农村教育考察，数年如一日，艰苦备尝，不怨不悔；还有一位是在读的文学博士，一直关注“三农”问题，不惟因周围盈耳的读书声而不闻院墙之外的风雨。他们的文字，反映了目前农村教育种种匮乏的真实状况，表达了对社会改革的迫切愿望。其中，那种奔赴的热情，担当的决心和自我牺牲的勇气，感人至深。

摄影 林卡伊



# 走西部

尚立富

生活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生活。

我到西部考察，为西部教育奔走和呼吁了整整6年。最初的目的，只是想在社会的大课堂里多学些真知识，觉得现在中国的教育都是叫人怎么去说，而不是去怎么做，这是完全脱离现实的教育。对于一个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来说，上一次学真的不容易，父母拿出点钱来供我上学，我应该学到一些真正在我生活所需要的知识，而学校却无法给我提供这个平台。

在我迷茫和困惑的时候，自己主动到现实的生活中去寻找。当我真正走进西部，了解到西部农村的教育的时候，我的心被那些现状一次次揪住了。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在不愁吃不愁穿的时候，还在不停地抱怨生活的不公平。而那些孩子却为吃一顿普通的白面高兴的时候，我被震惊了，这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可他们的脸上仍然露这灿烂的笑容，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而抱怨生活，仍然坚强的生存着。

我被他们的生活态度感动着，同时也明白了人生活的价值，如果一个人的一生能为最需要帮助的人做些事情，那又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在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自己经历过死亡的威胁，也曾面对过死亡。从死亡线上爬过来的我，现在小小的年纪已明白了很多东西。只有你亲身经历了，才会明白。曾经有过情绪消沉的时候，想过用很极端的作法——死亡来唤醒沉睡的人们，让他们从这一代孩子抓起，否则又有几代人被白白耽误了。现在认识了很多人，像杨东平、朱永新、营伟华、周小丽老师，他们给了我一个实现自己理想和梦的机会，我带着很多大学生志愿者奔赴在我曾经走过的地方，开始一点一滴的参与。

在我们走进他们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些孩子不但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笨，而是特别

的聪明，只是农村环境的限制，他们的梦都被大山阻挡住了。

我每当走进农村看到那些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时，我的内心总感到被什么东西揪住似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再看到一座比一座高的大山时，我常有一种莫名的叹息，他们是大山的儿女，他们终年守候在大山身边，除了哭泣也没有办法，只有静静的等待。

看到他们生活在所谓的教育只有语文和数学，医疗被肺结核、乙肝、艾滋病包围的时候，我感觉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孩子是无辜的，我们不能给他们的童年蒙上一层阴影。尽管我做不了什么，但我可以用爱，让他们找回对生命的热爱和生活信心，让他们多一点快乐和安全，希望疾病和苦难远离他们，让他们健康和谐地生存着！

在我国西部地区，尤其那些偏远地区，当我走过之后，才发现很多现象是我们以前所想象不到的，同样在一片蓝天下，其差距没想到有那么大。当城市里的老师、学生尽情享受阳光和物质文明的同时，或是抱怨生活的同时，可知道农村的老师和学生，他们在干什么？

在宁夏，我去了西吉县沙沟乡的桃宝小学，当时马校长带领我参观了整个学校。学校一共有五个年级，一年级有四十多个人，往上一个年级比一个年级人数少，五年级总共才七个学生，是个标准的金字塔结构。且学生流失很严重，辍学率和流失率都比较高，学校办学条件和教育手段都很落后。首先是破烂的校舍，大多数是六七十年代的土坯房，由于多年失修，大部分墙皮裂缝，窗户玻璃残缺不全，屋顶漏雨，有些学校的房屋到了无法遮风避雨的地步，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在我参观的几间教室里，室内光线暗淡，桌椅破烂不堪，设施简陋。墙上没有什么教室文化，除了几个红纸写的标语，后面也没有什么黑板报和评比栏。接着我又发现偌大的校园没有种树，让人看了很荒凉凄凉。我便问，马校长毫无生机地说：“年年种树，年年死，种了十几年，最后只有一棵小松树长了五年，还那么矮，成了这儿唯一的绿色。”我问为什么种不活，马校长接着对我说：“春天种上缺水，成活率不太高，活了让羊给吃了。”我不禁想这么多老师和学生都养不活树，那么外面敢种树吗？西部大开发，再造一个秀美山川，在这儿是不是也就成了一个梦？

在这所学校里，我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校园里我发现男女生在学校的东北角一个土堆里走来走去，一个老师告诉我那是他们的厕所，这个学校没有女老师，他们在土堆上挖一个土坑，中间是女生，两边一边是男老师，一边是男生厕所。我一下子感到很纳闷，我问了几位女学生，许多女学生都说这儿人多，刚开始不敢，但没办法现在已经习惯了，这儿的男生倒不在乎，这样的厕所现在来说，的确极为罕见。

后来，我就这个问题问校长，问他为什么不建个厕所，他只有一句话：“没钱”。



我又找到村支书，他也说：“没钱”。有几个老乡说这并不难：修个厕所用些土，再找几根椽子，在院墙的基础上，夯几道土墙就可以了。

这儿利用学校开了几次扫盲课，再也没有举办过其他任何给农民培训技术等活动，学校在这儿也是发挥着一个功能教学生识字，其他课都徒有虚名。我又来到这个乡的顾沟小学，这个学校有6个老师和150多名学生，有三栋砖木结构的校舍。倒是校园里一排排松树，使学校不再那么单调，才使得我看到了与上面一个学校截然不同的风景。正好这时校长回来了，这里的老师不叫他校长，而称呼他马老师。原来刚才他领着老师到很远的山沟里去捡石条，想把松树周围用石条围起来，来改变一下环境，使学生有一个好的学习氛围。

更让我吃惊的是马校长从山上还挖了些正在含苞欲放的花，自己种在花园里，霎时成了校园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他还打算利用劳动课的时间带学生把一些野草植被挖来给花园进行种植，来彻底改变学校的环境，使学校里有草坪。我被他的行动给震撼了。这也是千千万万所贫困学校之一，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现代化的雕塑，但他有创造的能力，让山区的校园具有山村的特点，不再等待上级部门的给予。他完全可以用土办法来进行，他还把土坯围成的围墙里面铲平，在上面用体育画面，和热爱学习等字样，装饰成另外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使人到这儿很温馨。这是我去过偏僻乡村给我感觉最好的学校，他们没有因为贫困而变得死气沉沉，反倒使这儿真正成了快乐的孩子天堂。

在青海治多县藏族居住地区，中学校长告诉我：

我对学校学生的培养没有了目标，学生一旦考不上高中你让他们干什么？县上连职业中学都没有，即使考上了也完全上不了，要到几百里远的地方上学，费用太贵，学生流失很严重。对于这种流失，我作为一个校长也许见的多了，有些麻木了。我们附近三个县，治多、杂多、曲玛莱情况大致差不多。有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想上也没法上，这是由于经济等各种原因，学生们要跑到200多公里远的地方去上学，其费用差不多就是上了一趟大学，这无形也给牧民增加了负担。现在贫困地区子女上学那可是真正的困难。

对于偏远的山区来说，课本不适应了，办学形式、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脱离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和乡情民情。教材只有30%能被接受。就拿语文课本的编写来说，藏文中没有编入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只不过是把汉文用藏文翻译了一遍，两种语言有时候意义不同，但用藏语和汉语就无法完全解释，而且一种形式的课文要上两遍，实在浪费时间，有些藏文根本就用汉语翻译不过来，只能是相近的意思，这样使得学生们给弄糊涂了。

这五年来，这所学校毕业了 300 多名学生，上高中有 100 人，占全部学生 30%，这 30% 大多数是干部子女。牧民子女，90% 随便流失，牧民子女学习再好，也不行，由于经济因素只得辍学。

许多藏族的贫困地区是偏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外地的学生分不进来，本地的毕业生很少或没有，造成了教师数量不足，教师学历合格率低。专业课教师缺口较大，代课教师占很大比例。体育、音乐和劳动技能课大多由其他教师兼任，而且许多教师没有经过正规师范专业的系统学习，综合素质差，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教师队伍不稳定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好一点的老师都想往外走，不愿呆在这里。现在不但基础教育存在问题，连高等教育也存在弊端，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实在，来到这里派不上用场。

有好多人认为西部人观念落后，人懒惰，贫穷是理所当然的。朋友，当你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以后，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很伟大。他们在靠天吃饭的环境里，一次次播种，又一次次补种，有时春天种 800 斤种子，可到秋天只收回了 200 斤，甚至颗粒无收。他们生活这样的环境里，我们有资格责怪他们吗？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帮助他们，理解他们，支持他们！

作者简介：尚立富，甘肃景泰人，一名普通的西部青年，先后就读于甘肃靖远师范学校、西北师范大学，1998 - 2003 年间先后 4 次以骑自行车、徒步等方式到东南沿海和西部农村实地考察，行程 9 万多公里，走访了全国 20 多个省市，比较、考察了西部的农村教育。

# 一位代课教师的自述

朱维娇

我父母非常疼爱我，一直培养我读书。由于早恋，我高中毕业后，考不起学校，就回家帮父母干活。我23岁那年，随着“普六”验收的到来，我乡缺少大量的教师，乡教站就通知我到我乡的大塘村去上课，从此我走上了代课教师的生涯。1997年，我调到龙江学校工作，一呆就是5年。

龙江村是一个100%的侗族大村，是一个鱼米之乡，那里的人热情好客，我对那里的风味小吃深有感触。我在龙江村上课5年，不做别的，一心扑在教学上，我的教学成绩显著。因为我从一年级跟班到五年级，跟班特别好上课，我上的是语文课，我学生的作文写得也很好，我也得到乡教站的表扬。这样，我对教育事业更加有信心，同时，我也认识到代课七年没有机会转正原因——因为我没有文凭。我已经落伍了，我应该去高等学校学习，增加知识，也应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2001年，我县教育局要一部分教师到高等教育学院进修学习，普及大专文凭，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毫不犹豫的跑到教育局报名，经过考试，被贵州民族学院录取。2001年8月我就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我在大学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也认识很多知识渊博的老师，我很崇拜他们。一位叫肖唐军的老师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作为老师，要有一桶水的知识，才能倒给学生一碗水的知识”。这句话至今成了我的人生格言，虽然在民院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我懂得我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

2003年7月，我大专毕业了，教育局不安排我们的工作，由乡教站安排工作。我知道，乡教站安排我们工作是上小学课，而且我们乡村小学又不开设英语，那么我所学的英语专业，就是一点用都没有。2003年8月22日我到教站报到，他们很欢迎我，我把原因述说一下，他们很理解，最后王站长说：“我们乡的小学，你喜欢到哪所小学，我们都答应你。”事情太出乎意料了。他们越对我好，我就越难过，越想干一番事业。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要来敖里建校，我只想把学习成绩搞好，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说：“我要到一人一校的地方去。”

和我谈话的王站长，还有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敢相信，不相信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也很难受。我知道，我以后的道路会更加艰难。

站长看到我很坚决的样子，就说：“我乡的学校，就敖里村是一人一校的地方，因为那里设有两个教学点，下敖教学点是一人一校，不过那地方山路不好走，而你又是一

个女的，回家走路不方便，最好还是到交通方便的地方吧。”可我的主意已定，这样就在下敖小学上课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敖里学校是怎样，我也没有想到要去那里建校，我只想去那里上好课，抓学习成绩。那地方交通闭塞，又穷，男婚女嫁与这个村从来没有关系，那里的姑娘嫁不出来，外面的人也不到那里娶媳妇，所以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很陌生，还很遥远。我想，这个地方山高路远，我到这个地方去，没有人看我，我活得太累了，我怕人家说我30岁了，还没有嫁人，花这么多钱去读书，也还是一个样，有什么了不起……虽然我外表坚强，其实内心很脆弱。

家里知道我要到下敖教书后，父母很惊讶，我特别害怕父亲难过，父亲问我一些详情，说：“是教站安排你去的吗？”我说：“不是，是我自愿去的。”我父亲急了说：“明天我到教站去说说看。”我抢着说：“我已决定了，你去说也没有用。”那天晚上父母跟我说了好多好多的话，我还是没有动摇，最后我又说：“我的事情谁也管不着！”可第二天，父亲还真的去了乡教站，教站也同意调整，可我还是不愿意调整，当天夜里，我父亲一夜没睡，一夜都在骂我：“这个家不是你的家，这么大的姑娘不当家，还要往山里跑……”我也不说一句话，但是眼泪却忍不住流了。

我不能呆在家里了，害得父母伤心。2003年8月24日，我到从江买了一些小东西，第二天就来到下敖学校。从这以后，我有一年没有回家。其实我很挂念家里，但是我不打电话回家，要打电话就打到叔叔家或邻居家问一问家里的情况，没有什么事，我就很高兴了。我不爱打电话回家，我要为自己争一口气，所以，有一年时间没有回家。

下敖小学比我想像中要好。这个教学楼是二层楼的架子，虽然一块木板都没有装，但如果装好了后，老师可以住二楼，如果装不好那就惨了，到夏天，地面潮湿，又怕蛇钻进来，也怕生病，教学楼破破烂烂，教室里的墙板是用藤子捆的，没门没窗。

我刚来到下敖的时候，由于学校没住宿，我在村长家住了一个多月，我觉得住在人家的家里多麻烦。我把1到3年级58个学生组成一个班上课，三级复式。我上课真的是太累太累了，一上午的课下来，连句话都不想说。我坚持差不多两个月，感到太辛苦了，我向上级领导反映后，又从上敖教学点调一个代课老师下来。

我看到学校那么破烂，心里很不是滋味——学生艰苦，老师也艰苦，住没住的。在人家家里吃饭多了，也不好意思，我自己也出伙食费，可还是在人家的家。放学后，总得帮人家干活，就是有作业要批改，也得先做别人的，然后才做自己的。老老小小都在干活，我不可能坐等人家。有时候，我心里在暗暗的哭，为什么要来受这个气。我感觉到我父母说的话太对了，现在我要回家吗？那是不可能的，我想了又想，于是我就去找村干，先装一个房间给我住。

为了达到目的，我只好请村干组长来吃饭商量，我进寨去买了一只鸡和一只鸭来杀，傍晚，他们都干活回来了，然后上门一家一家去请他们来吃饭，他们都来了。我和

村干们一起有说有笑的喝酒，吃在半中的时候，我提出装学校的事。我问他们有没有板子先装一个房间给我住，群众投工投劳可以吗？

干部们都说，“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外面的老师来住，所以我们没有装”。

我又说：“就是没有外面的老师来住，我们学校也应该盖好一点，装好一点，让我们的学生有一个好的环境学习。”

最后我又说：“明天你们能不能组织群众按投工投劳记工，把学校装起来。”村干们一一答应。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的酒，散餐后，大家各自东倒西歪的回家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听到组长喊道：“今天早上，去坡把牛草割回来，快一点，吃早饭后，大家拿工具来装房间给老师住，老师没地方住太不方便了，每家一个劳力，不来的一天扣10~15元钱……”吃早饭过后，群众陆陆续续的来到学校，大家你锯我推他砍，积极动手。中午，我正在上课，下课后，我看到他们很辛苦，就买一些便宜的烟送给他们，还端来凉水，群众们很高兴。有的说：“姑娘老师还不差嘛。”

装这个学校要一个星期才装起，有的群众积极，也有的很消极，我觉得这样很好，请全部群众吃饭，真的请不起，我还是请几个村干组长来商量学校的事，每家可不可以出几片瓦和木板给学校，把学校装好。他们说：“这正是秋收的季节，我们先把谷子收进仓后，再把学校装起来。”

秋收以后，他们投工献料，花了半个多月才全部竣工。学校完工了，学生喝水的问题还没解决，这时候正有国家特别照顾贫困山区的人饮工程队到敖里村修建自来水。我组织村里的妇女们挑沙子，又在学校旁建一个自来水井。这时下敖教学点才是真正的修建完工。我和群众开了一个简单的竣工典礼，组里出一部分钱，学校也出一部分钱，买一头小牛来杀，和群众搞一次会餐。那天晚上，我喝得烂醉如泥，心里有多高兴啊！

这个教学点装好后，教站检查工作的人知道后表扬我，我很知足，也很高兴。日久月久，我和那里群众感情越来越深，我的吃住不成问题，群众对我很好，我很感激他们。

下敖小学点的建成，我得到政府、教站的鼓励，对教育事业更有信心。我走遍敖里村，上敖教学点也是一个小如烟盒，乱七八糟的教学点，一年级还住在农户的楼脚下面，和牛圈并排；教学楼只能装70个人，老师没有宿舍，有一个简陋的办公室。但上敖教学点位置好，人口较集中，环境优美，学校的前面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溪上有一座风雨桥，左边有一棵参天大树，周围住着人家。

我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如果我在上敖建一个大教学点行不行呢，我一直在想，并亲自跑到上敖来和支书、村长商量，询问他们村里还有没有杉树，有多少，还够一栋学校的树吗？他们回答得很实在，说：“我们村的树多得很，我们村的树多得很，就是没有谁带头，一旦开工了，都是资金的问题。”

我说：“这很好，如果我要来上敖建校，你们同意吗，支持我吗？”村干们说：“肯

定支持。”我对建校心里就有底了，只要组织好群众投工投劳，我相信这个学校就能建成。然后我亲自打电话给我们乡党委罗朝明书记，请求从下教调到上教，这样有利于我和村干们商量建教学楼的事，罗书记表示同意。

2004年的2月，我调到上教学校，又召集村干、各组组长、部分乡干部、教站工作人员吃了一餐饭，公布建校的事。村干就组织群众把村里的杉树砍倒晒干，然后才能抬回来，这就是我真正建校第一步。

我来到上教村，为了和群众搞关系，我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请他们喝酒，在桌子上与他们交谈。由于这里的人文化少，思想落后，工作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村里的妇女更没文化。为了和他们接近，请他们来学校吃饭喝酒，或是他们请我到他们家里去。真的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群众关系搞好后，教学、生活方面都轻松多了。

群众倒树是在2004年5月份，9月份起房架，2004年的国庆节立学校。立学校时，乡所属单位分别捐资金500、100、10元，群众有物出物，大家吃一餐辛苦饭，喝一餐辛苦酒，这就是我建校的第二步。

说起建校就是资金，我是一个代课教师，每月工资是180元，又要生活，怎么建校？资金从哪来，我就想到贷款。为了能贷款，我写一份申请要贷2000元养猪，还请教站里的梁站长和我一起去贷款。到信用社后，里面的工作人员，看我是一个代课老师，工资太低，到时收不来账，不愿贷款给我。我闷闷不乐回到学校，我很苦恼，我吃不香，睡不着。我非常愤恨信用社的工作人员，钱也不是他个人的，为什么把钱卡得那么紧。

我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钱，走投无路。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回家。到家后，我父亲亲切的叫我：“大姐，回来了。”父亲这样叫我，我知道他不反对我了，态度变好了，但是我不敢说建校的事。每个星期我接二连三地回家，星期天帮家里做农活，和父母拉一些家常。离学校的日子越来越近，最后我还是把建校的事说父母听，我说：“建校对我转正有很大的帮助。”一说到转正，我父亲就毫不犹豫答应资助我建校的资，我高兴极了，我吊着的心，现在已经落地了——原来我父亲是那么的好的。这样我得了1500元作起房架费，我也放心了一半，建校已经有了一个开头。但装学校的钱去哪里找呢？我发现教里的村民买货物都要到20里之外的集市去买，我在这里开一个小商店，应该可以吧？学校立起过后，我请木工在学校后面的柴房装修一天，把厨房搬下来，然后用胶纸隔了一小间卖一点货，以200元起底，这就是教里学校的勤工俭学部。我以薄利多销为宗旨，经济效益还不错，现在已积累到2000多元的资金，这就是我建校的前后过程。

我建校的力量是微小的，我想通过媒体，让社会各界人士帮助我们这个贫困山区的孩子，改变这种落后的教育现状，教里村人民会世代代永不忘记。

作者简介：朱维娇，女，贵州省从江县小学教师。



# 呼唤阳光

周 原

打工子弟学校一般是指招收了大量外来人口学龄子女的非正规学校。据央视称，2003年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已超过500所。北京市张北希望学校就是其中的一所，它的黑板报上有这样一首小诗：我的歌在森林中，我是小松一棵；在群山中，我是小山一座；在春播里，我是种子一颗；在秋收里，我是苹果一个；在祖国大花园里，我是小花一朵。

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从大学生到文盲都有。他们很大一部分曾在家乡当过民办或公办教师，其余的则是半路出家，从包工头、小贩、厨师、菜农、建筑工、清洁工到保姆。执教者中有三分之二以前没有任何从教经历，大多刚从职高、高中或中专毕业，暂居于此，伺机跳槽，随时走人。学生家长大多是个体小商贩、清洁工和废品收购人员，因为这里不必交巨额借读费、赞助费，也不致受歧视，而且关键的是能有个安全的地方放孩子，至于能否念好书只能靠孩子自己。学生课本不用北京版教材，因为担心回老家户口所在地考试会跟不上。

我读过这些孩子们的一些作文。他们写着：“老师，你小时候穷吗？”“有一年中秋节，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买肉包水饺，妈妈就买了油条包水饺。没有钱买月饼，爸爸就用他买鞋的钱买了点苹果给我们。”“我非常喜欢学习，因为现在是竞争社会，我的爸爸妈妈都想让我考大学，然后找份好工作，不像他们一样没文化，找不到好工作，只能扫马路，又累又脏，工资又少，一个月的钱给我们交上学费、吃饭、交上水电房费就没了……”“我的愿望是考上大学来教像我们一样的学生，当校长，收那些像我们这样的孩子。”“爸爸每天休息的时候对我说，孩子，你要好好学习，长大不要和我一样，做这么苦的事。”“爸爸妈妈希望我当个什么官，既有权，又有钱。”“我家是卖菜的，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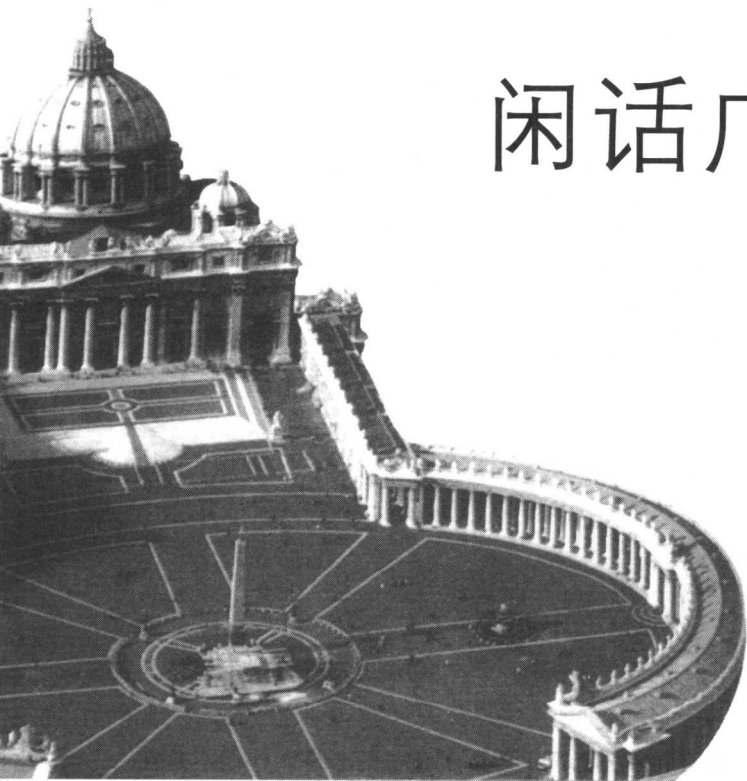
然很贫穷，但是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一定要出人头地。”“我知道爸爸挣钱不容易，我知道社会不公平。”

孩子的心声是真实而辛酸的，贫穷和不公已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心理。他们不是在一种宽容和自由的空气中成长，对城市怀有仇恨和自卑，一直伴随着藏在心里的那股阴暗的冲动。教育是立国之本，这一点已经说得太多了。中国已经实行了九年制全民义务教育，成绩并不理想，尤其是农村教育。这里只想列举一些数字。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外逃资金 700 多亿，偷税漏税金额至少 500 亿，查处各类经济贪污案件涉案金额 300 多亿，公款吃喝招待费用 1000 亿，城市从农村累计抽取税费 20000 多亿，近十年教育乱收费 2000 亿(据 2005 年初面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另见《中国青年报》、《21 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希望工程也成了最体面的慈善活动。同在蓝天下，阳光并未普照。

中国每年有两亿农民工涌进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已成为中国教育的一个盲区，考验着政府和城市的言行。语言已变得苍白和多余，仍然让数字作为本文一个没有结尾的结尾吧：

2003 年底，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公布的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结果显示，随农民工父母进入城市生活的近 2000 万流动儿童中，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按时入学。2004 年 7 月北京市教委公布数字显示，2003 年底，北京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数量为 24 万人。

作者简介：周原，女，文学博士，现居北京。



# 闲话广场春秋

散 木

圣彼得广场，巴洛克时期的建筑杰作，  
也是一部打开的教皇史书。

对广场这种城市建筑空间，现代人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不过，遥想广场进入中国以后的历史，恐怕许多只知道广场是休闲和“街舞”或者商品展销、公益活动等等场所的人来说，那就没有“历史感”、当然也可以说是很“幸福”的了，因为他们毕竟不会在夜间做有关广场的噩梦。比如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节之夜，毛泽东撇开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与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等乘敞篷吉普车进入广场上的人群中，结果人们争着和毛主席握手，因拥挤发生不幸，“那天晚上挤死了好多人”，即“那天踩死的将近十人，踩伤的上百人，傅崇碧肋骨挤断了三根”（王力《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此之前后又有人类有史以来极其壮观的所谓八次“大检阅”，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1200多万红卫兵沐浴在“红太阳”的照耀下，其中有多少人再也没有从“幸福”中活了过来，据说检阅后广场上遗落的鞋子全部堆放到工人体育场，就像一座小山似的，当然还有许多红卫兵抄家得来的金条等，这种景象今天的孩子们是绝难想象到的。《老照片》第15辑刊登过一张毛泽东的吉普车被迫“抛锚”的照片，也即他第二次检阅时因人群包围、甚至有红卫兵冲破警戒线躺倒在检阅车前要留下毛主席的壮举，于是在那瞬间历史有一个定格：毛泽东漠然着身边发生的一切，他旁边的林彪不知所措，68岁的周恩来似护卫长似的站在车尾